

全球经济弱复苏背景下转型进程再思考

——基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视角

范思凯 徐坡岭

【内容提要】 回顾原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历程,可以发现,转型本质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调整和重塑。转型实践表明,“国家至上主义”或者“国家虚无主义”的制度安排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已被历史所摒弃,而“市场至上主义”同样是失败的选择。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和相互协调的关系。

【关键词】 转型国家 市场化 全球化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公民参与的阶段性演进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2YZC810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转型政治经济学导论》(项目编号:10JJDCJW009)。

【作者简介】 范思凯,辽宁行政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徐坡岭,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原先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其中既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完全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又有像中国这样在原有体制范围内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①。

^① 本文所研究的转型,主要是原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包括拉美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场大规模的转型实践是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转型的进程而言,国家与市场层面的分离和重新整合属于市场化的问题,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重新整合属于民主化的问题。其内在核心都是放松国家的管制,赋予社会个体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自主选择的权利。表现为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作用及变化,即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和重塑。

一 转型进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 and 重塑

在传统的计划模式下,国家完全掌控生产资源、支配经济活动、分配经济利益^①。国家完全取代市场和社会,将其纳入国家统治之内^②。社会死气沉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则完全相反,要求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具有自主选择的权能。因此,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重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国家从控制向治理策略的转变。这些变化和发展也可以归结为人类行为与社会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化的历史过程。

(一) 转型第一阶段的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及其后果

从 1989 年开始,首先是东欧,之后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纷纷开启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市场化和民主化目标的感召下,激进的“休克疗法”成了大多数转型国家的不二选择。在迅速打破旧有秩序的同时,新的社会秩序未能及时建立,等待这些转型国家的也不是理论上预设的自由繁荣。

① 张素芳:《论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改革》,《江汉论坛》2007 年第 6 期。

② 肖恩·瑞恩按照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不同作用模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分为自由主义国家(liberal states)、社会权利国家(social rights states)、发展导向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和社会主义国家(socialist states)。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国家更愿意促进的是市场而非社会的统治地位;在社会权利国家中,国家和社会结成联盟以限制市场战略向高技术、高工资以及广泛的社会保护的规模发展;在发展导向型国家中,国家急切动员社会加入市场,国家和社会配合着市场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家把市场和社会纳入国家运作之内。参见肖恩·瑞恩著,吴雷钊摘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和市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1. 国家制度尤其是法制构建的严重缺失使转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转型之初,由于对计划集权体制的高度失望以及受新自由主义思潮^①的影响,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几乎完全遵照“华盛顿共识”^②的要求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爆炸式快速的转型道路,迅速向市场化和民主化过渡。在经济转型方面,这些国家实行自由定价机制,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鼓励民间私有部门的发展,重新设计适应私有经济的税收制度,创造新的金融部门,改革外汇制度,实施浮动汇率,推行财政预算和货币的双重紧缩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建立产权制度等。在政治转型方面,这些国家创建宪政,改革议会,建立法治,寻求三权分立,推行多党制,实行普选,扩大和保护公民权,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及信仰自由。在社会转型方面,鼓励公民社会发展,消除国家对私人领域的严密控制等。从理论预设而言,市场化经济转型和民主化政治转型将实现增长和民主的双重目标。然而,许多国家的转型结果显示,转型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和民主,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结构性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③。转型开始后的大约10年间,多数转型国家(除中国和越南等少数国家外)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秩序动荡,激进的制度变革虽然迅速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但却忽略了新制度构建的整合性和协调性。过于相信市场的神话,国家在新环境中尤其是转型进程中的作用被忽视。市场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完美,但由于实践中未

① 起源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兴起于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为代表的各个新自由主义学派,20世纪80~90年代又被官方积极推广并成为泛滥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经济政策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进一步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进行系统归纳,并冠之以“华盛顿共识”,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纲领。

②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 and 对策。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项主张(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阻碍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这些主张被称做“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中的实践后果引起较大争议。

③ 郁建兴、何子英:《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构性危机与国家建构》,《求是学刊》2008年第3期。

能充分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缺乏策略选择,未能形成实践的整合效果。同时,由于转型过程涉及社会制度结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刻调整和重组,势必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动荡。转型之初,很多国家生产衰退、不平等现象增加,失业率上升,国民预期寿命降低。而经济上的危机又进一步反馈到政治领域,表现为政府的频繁更替以及不同政治利益派别的激烈争斗。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往往存在一个强权的、全能的国家,那么,在转型时期,这些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往往“建立在大大弱化国家作用的基础上”^①。在经历了转型衰退后,中东欧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放缓了转型的步伐,重新确立转型战略,思考转型策略。可以看到,后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发生,既有经济转型战略和改革措施选择失当的原因,也有民主化与市场化相互干扰、制约的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因其较多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对国家角色、国家能力、国家制度建设或国家建构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②。国家制度尤其是法制构建的严重缺失使转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进入新的结构性失衡。作为社会公民同意形成的一种公共权力,国家自身的资源优势 and 权能优势决定了其在推动系统性、大规模制度变迁中的主体地位。国家能够综合自身的强制性及权力资源,调解和约束市场失灵行为,克服集体行动中存在的困境,促进制度变迁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 转型国家因缺少“华盛顿共识”政策实施的制度环境而陷入“新自由主义陷阱”

在转型进入衰退时期时,很多转型国家开始反思: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完成形态,“华盛顿共识”中的某些主张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总体上看,“华盛顿共识”迎合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否定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③。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外来和尚”的经书是远远不够的,“华盛顿共识”或者“北京共识”就是一剂药方,是否适用还需看每个国家的“病情”,包治百病的药是没有的^④。中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转型,以新体制的形成为基本目标,以快速自由化、私有化

① 苑洁:《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郁建兴、何子英:《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构性危机与国家建构》,《求是学刊》2008 年第 3 期。

③ 赖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与当代金融危机》,《江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

④ 范思凯、徐坡岭:《当代转型的多样化选择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 年第 9 期。

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组合为内容,以牺牲暂时的经济增长绩效为代价。由于激进式转轨着眼于长期绩效,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短期的经济社会混乱,甚至是退步。中东欧和原苏联国家等转型国家掉入“新自由主义陷阱”,自由主义的、激进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并未马上带来经济的繁荣,却造成严重的衰退。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认定市场化必然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缘于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经验的总结,其背后有几个假定:有效的制度环境、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其中,宏观层面上的假定是向市场化转型的国家有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如果没有这种制度环境,就应该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在短期内建立这种制度环境(这与市场秩序是自发的和自然进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自相矛盾)。微观层面上的假定是企业在市场环境下会提高竞争能力。事实上,这些假定条件只有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才有可能具备,转型国家恰恰缺乏这些条件^①。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东欧及俄罗斯等转型国家逐步放弃或结束转型初期激进的“休克疗法”,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转型道路。例如,为挽救局面,波兰政府于1992年果断结束“休克疗法”,推行新的“波兰战略”。加强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法制监督、改革国家的税收和金融制度、增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增加政府财政支出、重新实施政府预算赤字等。正是实行了坚决的稳定性措施,制定了合理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有效而彻底地改进了政府对私有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波兰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②。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改革之初就非常重视协调处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保持制度环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遵循一种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渐进改革、动态平衡”的逻辑。这种改革模式推动了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稳定^③。

(二)21世纪以来转型国家的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新变化

1. 转型国家开始恢复增长并逐步融入全球经济

经过10多年的艰苦探索,大多数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经历了转型初期严重的经济衰退后,这些国家已经走出经济运行

^① 范思凯、徐坡岭:《当代转型的多样化选择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9期。

^② [波兰]G. W. 科勒德克:《从“休克”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③ 同^①。

的最低点,进入复苏性增长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确立,市场经济各项制度深入发展,并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对全球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得到美国和欧盟的承认^①。基于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展,欧盟相继于 2004 年和 2007 年接纳 10 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转型国家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其市场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在这一阶段,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日益深入人心,新的社会价值体系逐渐确立,尽管在转型和改革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大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在经历了剧烈的制度变革后,转型经济开始向平稳和成熟过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转型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项制度安排的逐步完善和协调运转尚需时日,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全球化正在改变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特殊关系已被国际制度化,并创造出一个通过“内嵌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而组织化了的相对稳固的国家经济体系。在失去先前对跨国贸易、财政和产品的控制力的同时,国家发现他们正努力应对来自地方和全球市场的双重压力^②。

2. 市场机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宏观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几次大的、划时代的争论。产业革命之后,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强调市场的作用,不主张政府干预^③。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人们对市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成为主流。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经济大滞胀,又重新回到经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重振。但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经济运行的宏观环

^① 基于俄罗斯的转型进展,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已于 2011 年 12 月正式批准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入世”将推动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给贸易伙伴和企业带来稳定的贸易环境,有利于统一贸易规则的推广。对于俄罗斯实施创新经济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能源原材料的过度依赖以及从资源出口国家转型为创新经济国家具有推动作用。

^② 肖恩·瑞恩著,吴雷钊摘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和市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③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给现代国家分配了三个不可或缺的任务:一是保护本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和侵略;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之任何成员,免遭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事务和某些公共设施。

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的有效性面临考验。首先,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自发调节作用是对实体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概括,但在虚拟经济中,市场自身的运行可能导致经济出现泡沫^①。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其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货币经济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其根源在于投资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这种动机里投机的成分太高,大家都想“钱生钱”,经济泡沫一再出现。对于每个投资者来说,其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但大家都如此的结果是经济危机周期出现,每个人都不能避免损失。这个时候,需要公共权力机构出面解决这种“合成谬误”^②,这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支持。其次,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市场经济出现严重的“共振”问题,而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强化^③。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全球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使得社会民众缺乏安全感。反映出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复杂市场经济环境,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转型面临许多新的严峻挑战。

二 市场万能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渗透和垄断

全球化和信息化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其垄断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契机。于是,市场万能论的主张大行其道,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累积的结果不仅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改革误入歧途,而且使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陷入日益严重的失衡,最终引发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

(一) 国际金融危机中转型国家绩效的差异

2007年8月,由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世界经济,转型国家亦不能幸免。危机迅速从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整个转型地区出现普遍的增长下滑。在全面分析了转型国家的绩效后可以发现,东欧的一些转型国家先后经历了经济私有化改革和加入欧盟的对外开放过程,形成了高外资、高出口、高负债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存在外资依赖和产业集中度过高等风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大幅下滑。

① 杨龙:《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反思》,《行政论坛》2010年第2期。

② 同①。

③ 丁忠兵:《对市场经济有效性的几点思考——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层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09年第5期。

而那些对外资和外部市场依赖程度低的转型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李福川研究员认为,俄罗斯没有发生类似 1998 年金融危机时经济崩溃的现象,其中两个重要因素是:国家资本不断扩张,政府对市场经济具有比较有效的调控垄断能力;健全和完善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持了社会领域的稳定^①。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成则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强力介入是俄罗斯经济史中的一个传统,在俄罗斯陷入混乱之时,每次都能够在这一体系获得重生^②。正是由于国家调控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使得一些转型国家降低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而市场经济尚在建立之中的中国由于金融尚未实现自由化,尽管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但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种新的经济、政治现象说明,以往的经济自由主义需要重新检讨,应该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③。

(二) 全球资本市场“绑架”国家和社会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盟是自由主义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带来一套保护资本特权免受社会权利以及国家地位侵犯的市场规制。即使在欧洲,在跨国政府机制高度发达的地方,通过减少贸易壁垒而形成的“消极一体化”控制了通过在跨国层面上创造新的市场规范机制而生的“积极的一体化”^④。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本流动给了公司扩大的权力:要求国家和社会作出让步。国家在成为企业关键伙伴的同时,其作为公民协会的角色也在日益减弱。一些转型国家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依赖越发明显,致使政府往往忘记自己的职责,忽视了自己的立场,把公共利益抛在脑后,沦为资本的工具^⑤。市场、国家和社会三者处在不平等的关系中^⑥。可

^① 张守常:《2010 年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综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② 徐坡岭、王志远:《“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其与中国的合作”学术研讨会综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 年第 3 期。

^③ 杨龙:《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反思》,《行政论坛》2010 年第 2 期。

^④ 肖恩·瑞恩著,吴雷钊摘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和市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⑤ 同^③。

^⑥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认为,国家是处于社会和市场之上的第三方。一方面,国家要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但又要对市场过分侵蚀社会的行为进行管制;另一方面,国家既要保护社会,但又不能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致对社会造成灾难。国家如何在市场尤其是全球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保持自主性,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开放经济环境下,资本操纵能力越来越强大,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绑架”了国家和社会。

三 结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动态协调

当前,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弱复苏格局。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增长,欧洲和日本经济仍将低迷,新兴市场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在经历了转型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原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虽然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但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根本逆转,表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转型目标已经深入人心并逐渐固化。原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进程和融入世界经济的实践表明,“国家至上主义”或者“国家虚无主义”的制度安排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已被历史所摒弃,而“市场万能主义”同样是失败的选择。转型的特殊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转型国家政府既要致力于原有计划体制与引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又要对国际一体化过程进行恰当的管理,还要有缓和经济变动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措施。我们要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抽象对立。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是这样的:它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要受到约束,由国家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最低限度的物质福利^①。

我们应该明确,国家、市场和社会是维系有序治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治理机制,各自具有优势和不足,只有综合利用这三种机制,使之优势互补、动态协调,才能促进秩序稳定和持久繁荣。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是一种平行的、动态平衡和依存的关系。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需要市场配置资源,需要国家制定和维护规则,需要社会的信任协作和自由选择,三者之间是动态平衡的关系。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政府或政治家应该具备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和策略,在转型进程中努力构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动态协调与平衡的全新治理架构^②。

(责任编辑:农雪梅)

① [美] 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② 范思凯、徐坡岭:《转型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摆脱及资源匹配》,《改革》2013年第3期。